

汲取大学精神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张岂之

尽管世道沧桑，今是昨非，但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从家乡江苏南通远赴陕南城固读中学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陷入敌手，我还是一个少年，只好被送到大后方去继续学业，遂于1939年8月考入迁至陕南秦巴盆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初三，亦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高中部，时已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刚刚由古路坝迁至城固东城墙外的老爷庙。附中虽非高等教育，但它也是西北联大的一部分，同样遭受战争磨难，同样千里迁徙，深受西北联大精神的感染。

附中地处城东汉江畔，虽不过几十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极其简陋清苦，但却有了一片可以安静读书的地方。老师们风尘仆仆地登上讲台——小土阶，津津有味地讲起课来。大清早，当晨雾尚未从江面消失，小操场上满是从战区来的少男少女们，有的朗读英语，有的背诵古文。他们的衣服和体形极不相称，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还有读书的机会，这已是很大的幸福，生活苦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在汉江边晨读，在油灯下自习，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课余闲暇便会钻进街上的一间间书店，抱着一本本书贪婪地吸允其中的营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都是令人迷恋的，这种读书的狂热，也冲淡了思乡之苦，不免苦中作乐。

有一次考试之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制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四起。那几天，大家燃起蜡烛，照亮了教室，也照亮了学子的心田，多少年过去，那束烛光仍然令

我难忘。在我的记忆中，此前此后，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亮”。那时，每天夜间我们都要掂量一下，看烛燃去了几分。当烛只剩下短短的根，我们便珍惜地把它包起来，作为光明的种子，藏在书包里。后来，当我离开这座小城，跑到嘉陵江边一所高中读书，从此便和油灯、土烛告别了。可是在宽敞的教室里，明亮的电灯却打动不了我的心。在我心的深处，我还惦记着那束烛光，可是烛的根已不知丢在哪里。三四十年以后，回了一趟城固，踏访旧地，虽已面目全非，但仍不失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从1952年来到古城西安的西北大学教书，60多个春秋弹指一挥间。老子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扎根西北始于西北联大，我们应当珍惜，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由此，我走进了南开，走进了北大，走进了清华，结识了北师大和北平大学校友——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走进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也走进了西北联大的后继学校西北大学。1985年3月31日和1985年4月9日：一个是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之日；一个是我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日。在这八九天时间中会有很多时间冲突，但是我的决定是，即使二者有冲突，我也必须首先出席校友会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推举原北平大学校长、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常委、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徐诵明先生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我至今还记得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校友，诵读贺信时那慷慨激昂的一幕。在此前后，西北大学又推动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为46名“脱党”校友连续计算党龄、补发一批校

作者简介：张岂之，男，江苏南通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史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侯外庐学派领军人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

友的毕业证、组织校友回校座谈、重写校史，多视角开展西北联大研究，复于2012年发起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西北联大渐为人知，据说仅从2012年到2015年在网络上的访问即达1750万人次。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著作讲述西北联大的故事。讲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它的大学精神。

概括起来，西北联大精神就是“团结御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兴学强国”的创业精神，“公诚勤朴，矢志报国”的奉献精神，其核心是爱国奉献和兴学强国，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就是它的精神，最根本的精神。西南联大的“南渡北返”与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对此，通过漫长历史风雨的洗练，才能看得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越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西北联大教育实践的成果会越来越加珍惜。

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言论，主张多写人文普及读物。其实，这对学者来说，是个考验，这需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很深刻的研究、丰厚的积淀，否则是写不出来的。姚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科学史出发，提出西北大学两源说和建校百年的文献证据，向学校提出举办西北联大论坛的建议，并坚持不懈地从事西北联大研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和陕西省出版基金资助，相继完成《西北联大史料汇编》《国冀播迁：西北联大通史》（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国家档案局资助项目）《西北联大简史》和《西北联大教育思想》（陕西省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多部

著作。因此，由姚远完成《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是很有基础的。

我很认同他关于“历史需要诉说，需要讲故事”“西北联大叙事方式需要转型”的说法。同时，也很赞同这本书的谋篇构思和逻辑结构。其中“怒发冲冠只为学人的徐诵明常委”“《西安临大校刊》报道杨秀峰在太行山打游击”“一封来自延安抗大的信”“毛泽东的两任保健医生姜泗长与黄树则”“龚全珍在西大”，都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史实，其中“第一个到达死亡之海罗布泊北部和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千里无人区的黄文弼教授”“安息于页梁山的殷培璞”，读来尤其使人感动。另外，在新增的“西北联大与汉中”一节中讲述的：“魏寿昆、雷祚雯、张伯声三教授深山勘矿”“西北大学学生首次调查城固物价”“《雷雨》的公演”“陆懋德赋诗汉中古迹”“为汉中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傅鹤峰教授”等故事，大大提升了西北联大教化一方、服务社会的独特贡献，也为地方纪念、保护和利用办学遗址提供了翔实有趣的历史依据。

以上所说与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都是相联系的，从历史故事更能体会今天现实的需要。

今日大学的责任不外乎教书育人、学术创新、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而通过《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这样的力作，展现我们的大学之道，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实现这些职能的重要抓手。让我们重新燃起汉江畔茅屋教室里的那束烛光，讲好西北联大故事，传承光大优秀文化，奔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